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7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三十四辑 2008.2

陈抗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王勇 我被「芝加哥化」了？

赖德胜 经济学家的关键词

陈惠雄 两个农民是如何界定产权的

王跃生 有感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

聂辉华 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

翟华 中外名牌：假作真时真亦假

周业安 有感于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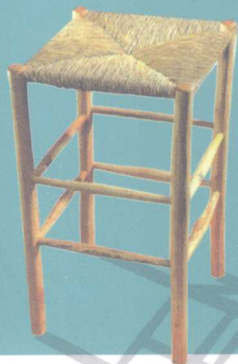
储小平 逢年过节：关系契约的一次结算

陈彩虹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王天义 节能降耗：韩国的做法与启示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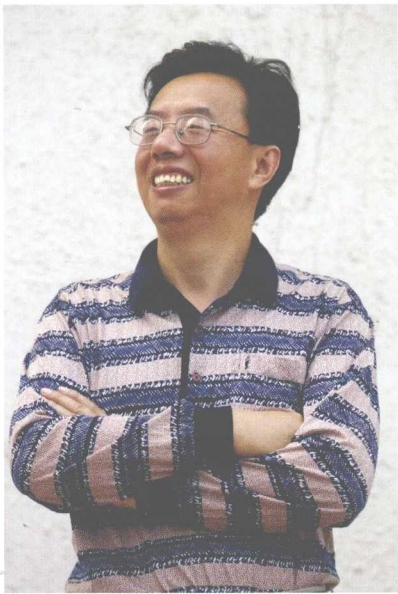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客”风采

顾海兵，17岁时高中毕业赴本县最不发达的村投亲插队务农，14个月后突闻高考恢复，立即启程回家。自觉理科有优势，一直为此努力。在通过不分科的初考后，临近复试十余天时突然得知高考登记专业是文科，找尽关系无法更改，硬着头皮走进文科考场。没多少选择，觉得也没什么机会选择，但结果却是歪打正着地进入了黑龙江商学院商业经济系，4年后又幸运地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再3年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从教至今。没什么胆量，大概要从“人大”而终了。



感谢《经济学家茶座》，开垦了这样一个处女地，使中国的经济学能够回归社会、回归真实、回归百姓；感谢《经济学家茶座》，培育了这样一个园地，使中国的真正学者有自由种植的机会；感谢《经济学家茶座》，经营了这样一个茶园，使中国的经济学爱好者有制茶、饮茶、品茶的空间；感谢《经济学家茶座》，开辟了这样一块草地，使中国的野草在正厅正堂（正刊、核心刊）之外能够顽强生长。屈指算来，《茶座》已经坚持了8年，可谓不容易、不简单、不平凡！致敬明善兄、小洪兄及《茶座》各位编辑！

——顾海兵



经济学家为什么爱写随笔?

徐康宁

不少很畅销的报刊都有经济学随笔的栏目,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并愿为此而投入写作的精力。写得好的经济学随笔,受到读者的热捧,刊登经济学随笔的报刊也更加兴旺。

经济学家为什么爱写随笔?有人把它归结于媒体经济学的盛行,甚至和中国经济学界特殊的生态环境挂起钩来: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某个领域的研究有公认的突破,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成天见诸各种报刊,包括发表的谈话和大众化的文章。这样看似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爱写随笔,可是,国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名家,十分爱写随笔。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克鲁格曼等都曾有《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上的随笔专栏。经济学家爱写随笔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不分中国和外国。

经济学家写随笔,首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自己的文章,更大范围地传播自己的思想。经济学家平时写的学术论文读者面是很有限的,甚至有的领域写文章的有几十人,看文章的也就几十人,谁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呢?有的经济学家经常写随笔,是因有感而发的思想冲动。对一个经济现象作出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对一个经济政策作出及时的评述,写作者不吐不快。若等到有模型、有变量的长篇大论写出后,一些经济学家反而没有痛快感了。当然,不少经济学家同时在写那些大文章。还有的经济学家善于驾驭文字,以文笔优美见长,不仅学问高深,而且写出来的随笔散文也让人惊叹。克鲁格曼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几本随笔一直是国外书店的畅销书。这时,经济学家写随笔散文如同享用美味的点心,心情好极了。有没有经济学家冲着随笔的较高稿酬而作的(有的专栏润笔费颇高)?相信即使有也很少。因为和经济学家其他行为相比,写稿子还是属于边际收益很低的。

既然是随笔,内容和写法上就无定式。可以严肃,可以轻松,也可以诙谐。不过,作为经济学随笔,还是应该要有思想的火花、理论的联想,能够启迪读者尤其是非专业读者的心智。轻松不代表放松,有趣不意味着浅薄。文学中有“小女人文章”的说法(并非对妇女不敬),写经济学随笔也要讲究“口味”。那种看到白菜想到“白菜经济学”,见到豆腐写出“豆腐经济学”,写多了,也会把读者的胃口倒掉的。



经济学家茶座

(第34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刘德久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系列《茶座》编辑部主任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卷首语】

徐康宁 经济学家为什么爱写随笔? /001

【国是我见】

陈 抗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004

许 斌 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时期了吗? /008

茅于軾 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回顾我国改革的起点 /012

俞宪忠 让中国农民富裕并不难 /016

韩朝华 官员行为的公益性和私益性 /019

【学界万象】

王 勇 我被“芝加哥化”了? /024

赖德胜 经济学家的关键词 /031

詹宇波 走向“艺术化”的中国经济增长 /034

赵红军 从林毅夫的世行任命看中国经济学家的角色 /039

张永山 大瑶山访费老并王同惠女士足迹 /042

【学问聊斋】

陈惠雄 两个农民是如何界定产权的 /045

王跃生 有感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 /050

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醉汉” /054

邵 军 经济学中的形式革命 /057

俞炜华 活用中国传统文化讲授经济学原理 /061

松 木 自然·人·经济学:一些趣想 /066

【经济随笔】

聂辉华 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 /071

- 刘福寿 我的胃在哪里?
——我对公共管理系统的一种个人理解 /076
- 陆 铭 笨,并快乐着 /081
- 杨在军 现代家族企业“传内不传外”刍议 /083
- 李长安 户口为何会“害死人” /086
- 韦 倩 电影《神探》的经济学感想 /091

【经济评论】

- 翟 华 中外名牌:假作真时真亦假 /094
- 曹利群 冰雪灾害中的政府和市场 /099
- 胡海鸥 风物长宜放眼量 /104
- 冯维江 利益集团转型:堕落还是升华 /107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周业安 有感于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模式 /113
- 储小平 逢年过节:关系契约的一次结算 /118
- 陈 宪 由“买蛋”、“卖蛋”的尴尬说起 /122
- 刘宝宏 “又好又便宜”的家庭装修 /126

【经济书评】

- 梁 捷 国家理论的两次范式迁移 /132

【他山之石】

- 陈彩虹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135
- 辛向阳 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及给我们的启示 /144
- 王天义 节能降耗:韩国的做法与启示 /150
- 朱富强 为什么那些民主国家往往显得更为好斗?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34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209-04468-4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

-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第055057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172×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元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陈抗*

每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存在部门利益(包括地方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部门利益像我们中国这样和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联系得这么紧密、在体制中获得这么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部门利益个人化演变到今天,已经直接地危害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市场机制的建立,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社会中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和危机事件,都与部门利益个人化有紧密联系。部门利益的喧嚣是和谐社会交响乐中最刺耳的噪音。整合部门利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部门利益个人化曾经 是一种“风险补贴”

部门利益个人化,实际上是改革初期为了激励政府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而提供的一种“风险补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对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结

论。能够从上到下推动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重新陷入“放”与“收”、分权与集权的怪圈。要把握历史的机遇、形成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就必须推动自下而上的全方位改革。而民众当时对改革有巨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源泉。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体现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的强烈欲望。只要不受压制,这股改革力量就能够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给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注入强有力的生命力。显然,自下而上的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广大群众挖计划经济墙脚的行为会不会容忍、敢不敢放任。

然而,地方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由于维护计划经济的法规仍然有效,而改革的试验往往要经历一段“不合法”的过程,支持或者默许改革就意味着要冒“违规犯法”的风险,很容易被抓住把柄而受到

*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

整肃。今天的改革急先锋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因此,即使那些思想解放、务实求新的地方干部也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中箭落马”。所以,改革领导人一方面要不断呼吁干部们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另一方面,还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官员支持改革,把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市场化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财政困难、政府官员收入低的条件下,允许政府部门创收以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便成为一种“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创收政策与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隐性补偿机制。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得到认可。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商店、企业等经济实体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创收结果的差异性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政府官员的奖金与福利出现很大的差别,进一步激励他们通过制度创新扩大创收、改善个人福利。

隐性的补偿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阻挠和限制,使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得以大面积、大范围地推展。与此同时,一个自身利益与市场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利益集团逐渐在体制内形成,使改革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政府部门的创收活动逐渐演变成

制度化的集体腐败行为。当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之后,支持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继续允许政府部门创收相当于提供过时的“风险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特点和危害

部门利益个人化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三大鲜明的特点。一是部门利益个人化的合理性不受质疑。部门领导维护部门利益时理直气壮,俨然一脸为集体谋福利的大义凛然。上级领导对此行为也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有过“屁股指挥脑袋”的经验。政府部门利用特权,通过违反国家法规的方式获得部门利益,最后集体分肥。而人们对这些集体腐败、公款行贿的现象也开始见怪不怪,有的甚至公开地总结和传授“创收”经验。

第二大特点是部门利益的合法性由于在界定部门权力时广泛使用“创造性模糊”而逐渐树立。随着改革的深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法规被淘汰,市场经济的法规也逐步建立起来。然而,由于立法过程不讲究利益回避,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一方面试图将本部门既定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想争取更多的利益。激烈的讨价还价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而最好解



决方法就是“创造性的模糊”。模棱两可的法规造成行政权力多头授予,赋予多个部门规章制定权,为部门竞相创租留口子。

第三大特点是“创造性模糊”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出现“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现象(对于“反公地悲剧”的概念,本人在《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争夺监督、检查、审批权。因为有了“合法管理权”就有“合法伤害权”,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多个政府部门在他们管辖的行政“公地”上竞相创租、抽租,毫不顾忌他们的攫取行为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带来的总体伤害。另一方面,从“合法伤害权”衍生出来的“合法扶助权”也可以为部门获得利益。帮助被抽租对象减少“伤害”往往需要阻挠别的政府部门行使权力。所以,一部门行使“合法扶助权”就会限制其他部门权力的行使。多个部门一起行使“合法扶助权”,互相牵制,使政府的执政能力成为一种“反公地”。实际上,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制约其他相关部门的管理,但是没有—个部门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权。那些由七八个政府主管部门共同下达的红头文件看似来势汹汹,实际上效果甚微。

显然,部门利益个人化危害极大。

首先,“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大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见利益就争,见服务就推,见责任就躲。只有等到问题累积成危机时才有人过问。

其次,创收游离于正常财政开支之外,其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形成了腐败的温床。集体腐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

再次,政府部门的创租活动鼓励垄断、限制竞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攫取行为给中小型企业 and 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设置进入壁垒,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这对于市场的培育、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另外,部门利益的影响使公平竞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无法建立。中央各部委的规章以及各级地方人大的法规不一致、不协调也影响法规的权威性。

最后,创收导致政府部门的不断膨胀。为了创收,需要扩大创收队伍。而创收队伍的扩大又制造了创造更多收入的需求。

整合部门利益势在必行

整合部门利益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切割。

首先要规范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转型过程中靠部门创收提供激励的方式必须停止。对公务员、政府官员的激励应该为级别晋升,相应的收入和待遇必须由国家统一规定、发放。

其次,要立法废除和禁止预算外、体制外收入。所有政府收入、开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内,受各级人大监督。中央、省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必须合理化和制度化,也必须立法杜绝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层层盘剥。

最后,要建立利益回避制度,通过立法解决多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的问题,清楚地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以上三点改革必然会牵涉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受到多方阻挠。但也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998年中央禁止军队经商、分离军队企业的变革就是一个先例。当时涉及的利益之多、人员之广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一旦中央下定决心,辅之予合理的利益补偿,变革的攻坚任务还是得到圆满完成。

整合部门利益与目前正在酝酿实施的“大部委制”有实质性的区别。诚

然,“大部委制”可以减少部委外的职能交叉。但是,如果不在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作切割,部委内实质性的整合将难以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利益格局没有改变,各种创租和抽租活动也不会减少。现在有一些地方实行了“阳光工资”制度,希望以此来废除创收和小金库,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从实施的初步效果看,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对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管,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废除部门创收。而这方面的立法、执法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理顺,都必须在全国统筹解决,不是单一省、市力所能及的事。

其实,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不但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于一些部门领导来说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没有了扭曲政绩观引导下攀比竞争的浮躁,换来的是量入为出的实在。告别了庞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告别了为把盘子做大而不惜冒险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提心吊胆,还告别了为遮挡伸到盘子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手而产生的各种烦恼。从乱到治,有失也有得。



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时期了吗？

许斌*

进入200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冰雪天气。这次冰雪天气的严重程度应该是超出了所有气象学家的预料。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解释这一气象现象的理论模型,但有两点似乎可以肯定。第一,这一气象现象不是中国国内因素单独可以解释的,一定是全球气象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这一气象现象不是短期因素变化造成的,一定是中长期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的结果。

无独有偶,2008年初全球经济也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寒冬。随着全球股市的暴跌,美联储破天荒地在八天内降息125个基点,中国经济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阵阵寒风。全球经济的这次寒流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在2007年初已受到关注,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它的影响将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引用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原话说,“在强劲的增长和通胀关注下降的背景下,全

球金融市场形势总体良好。尽管在2007年2月至3月期间金融市场出现一段时间的波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股票市场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长期实际利率一直低于长期趋势,而且大多数市场的风险利差已经缩小……预计今年美国经济随着房地产部门的影响消退,将在年内重拾增势。”即使在8月份次贷危机明显恶化后,美联储仍然低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在之后三个月中总共才减息100个基点。伯南克在这段时间对次贷危机的应对不力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美联储主席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和今年中国突发的冰雪危机一样,世界经济今天面临的危机也是全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结果。近年来流行一种“脱钩”(decoupling)理论,认为世界各国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已经大大降低,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对其他国家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波

*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及到世界各国，显示出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关联度超过“脱钩”理论的预期。人们在认识时之所以出现偏差，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习惯于关注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等全球实体经济方面的相关性，而对全球经济在金融领域的相关性缺乏足够的理解。虽然经济学中有古典二分法和货币是面纱之说，经济学家对金融的作用仍然极其看重，因为金融关乎资源配置。然而和实体经济因素相比较，金融因素更难被看清。如果观察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世界贸易总量和世界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我们会得出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这个结论。但是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在金融方面的联系程度比我们知道的可能要紧密。而问题在于，各国经济之间在金融方面的联系究竟有多紧密，通过哪些渠道在起作用，我们知之甚少。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许多大银行出现巨亏，露出了全球金融风险的冰山一角。当金融产品发展到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看得懂的时候，难怪伯南克也失去了把握能力了。

最近在读米什金所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07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米什金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联储理事。我在哥大当学生时旁听过他的课，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学者。米

什金认为全球化的下一个浪潮是金融全球化。一般认为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为第一次全球化，当时国际贸易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增长到20%，国际资本流动量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7%增长到20%，全球移民数量也达到了历史峰值。第二次全球化发生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此期间，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0%以上，国际资本流动量从1973年占全球生产总值的5%增长到了21世纪初的21%(以上数据均引自米什金的这本著作)。米什金指出，金融国际化目前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发生，而当前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占资本流动总量的比重重要远低于第一次全球化时的比重。米什金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和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融合将是下一轮全球化的标志。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印证了米什金的判断。近年来世界上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巨大，而中国等亚洲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确切地讲，美国经济失衡了，亚洲国家经济失衡了，而全球经济通过亚洲国家对美国的资本输出达到了平衡。我曾经开玩笑说，全球经济就像一对夫妻，



中国是拼命挣钱的丈夫，美国是拼命花钱的太太。要维持家庭的稳定丈夫只能将辛苦挣来的钱给太太花。如果丈夫哪一天不愿意将钱给太太了，两个人闹离婚，日子可能也不会好过。所以，这个看似失衡的家庭比人们想象的要稳定。问题是丈夫挣钱挣得太卖力，造成“流动性过剩”，而太太觉得钱来得容易，也就肆无忌惮地超额消费。

全球化就是各个国家在一起过日子。全球化的好处是明显的，它使各国的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第一次全球化期间全球人均 GDP 增长率为 1.3%，第二次全球化如果从 1960 年算起全球人均 GDP 增长率为 2%，而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接近 5%，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实现这样快速地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革命和资源全球优化配置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了这个机遇，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明星。

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传统经济领域大显身手之时，发达国家也没闲着。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实体经济对金融的依赖性也日趋强烈。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CNBC 举办了一个讨论会，题目是“谁是老大？”(Who's in Charge?)会上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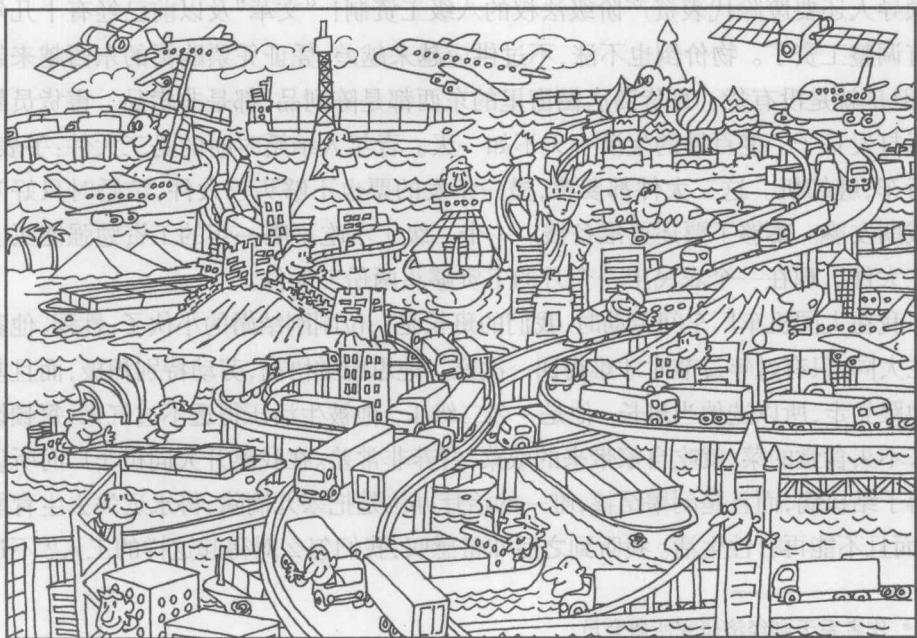
个问题展开辩论。第一，各国的央行是否在经济治理上已经失去了方向和控制力？第二，主权财富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否已经成为新的权势拥有者？第三，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警察长”(Sheriff)来管辖全球金融市场？每个问题由正反两方各用四分钟来阐述，然后由几位评委点评，正反两方各有一分钟的最后陈述，之后由现场观众投票。在第一场 PK 秀中，正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他的发言秉承着一贯的对管理者的批评风格。反方是美国前财长斯诺，他对央行的辩护显得中气不足。评委席上哈佛大学萨默斯教授的点评最简洁到位：要给央行的近期表现打高分是很难的。听众表决中 59% 赞成正方，41% 赞成反方。在第二场 PK 秀中，正方是经合组织总秘书长，反方是科威特国家银行总裁。尽管科威特人为主权财富基金作“无罪”辩护，但听众以压倒多数(81%)赞成正方。在第三场 PK 秀中，正方是索罗斯，反方是这场讨论会的赞助商印度 Infosys Technologies 的总裁。让善于利用全球金融市场监管中的漏洞而大发横财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来呼吁对全球金融市场加强管制实在有点讽刺意味。不出意料，大多数听众不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警察长”。

这场不到一小时的 PK 秀很是引

人入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 wic.cnbc.com 看视频。而讨论会的三个问题透露出的是金融全球化这场大博弈中不可回避的挑战和困境。学过博弈论的读者知道，在不合作博弈中如果能够找到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那么就有共赢的可能。然而各方又有偷偷争取自身利益的冲动，弄不好会陷入双输局面。正如讨论会中一个评委所言，电影院里可以是大家都坐着看电影（双赢），也可以是大家都站着看电影（双输）。金融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能力是巨大的挑战。

全球经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08 年的第一场雪冻伤了我们的手脚，但也刺激了我们的大脑。在上面

提到的达沃斯讨论会中，中国被多次提及。斯蒂格利茨在评论央行的绩效时声称全球过去十年低通货膨胀的功劳应该归于中国低价的出口商品。科威特国家银行总裁在为主权财富基金辩护时声明它们不会构成威胁，除非来自中国。在讨论全球金融市场“警察长”时，一位评委说美国、欧盟和中国需要协调一致才行。有趣的是他的邻座是个印度人，悄悄地提醒他还有印度。该评委毫不犹豫地说，印度等到十年以后吧。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个刚开始发育的少年，但世界已经等不及了。中国能等吗？





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回顾我国改革的起点

茅于軾*

记得《白毛女》剧本中有这么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现在要说的是，“文革”又把中国人变成了奴隶。

“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是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是没有的。就业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就朝农村卸包袱，把青年人都赶到农村去。就是所谓的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党本来说过，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又叫大家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工厂里普遍地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是又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当时的领导人还要废除代表资产阶级法权的八级工资制！“文革”及以前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问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够买两份三大件。

我在大同机车厂车间劳动时，我们的班长是一位刚刚结婚的小伙子，姓穆。他家乡不在大同，只有过年过节时才难得回一次家。他思想觉悟高，劳动特别积极，而且坚定地跟党走，所以选他当班长。他是一名二级工。他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每顿饭从来不买食堂的菜，就吃自家带来的咸菜，营养非常差。在我离开大同机车厂时听说他得了结核病，而且是副睾结核，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把睾丸摘除，将永远失去生育能力，而且不能再有性生活。我听到之后非常感叹：我们怎么对得起这样的工人？不过

*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也说明当时宣传的成功。现在大家生活比那时候好了好几倍,可是牢骚却比那时候多得多。现在的宣传远不如过去有效。

那时生活苦,没有任何人会想着去赚钱。现在大家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文革”时没有贪污,我想不是人心好,而是根本没有可供贪污的钱。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里的售货员,他们手中的权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他们的手。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千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城里人穿什么衣服?现在大家都穿西装。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把西装改成了中山装。中山装也只有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如果是别的颜色就把它染成蓝的或黑的,所以那时染房特别发达。现在染房很少了。后来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了,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裁缝不会做。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基(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后来改革开放了,有些胆子大的穿起了高跟鞋。可是路上就有人把她的高跟鞋剁成平跟鞋。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大家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在“文革”时是想象不出来的。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公务或私人旅游,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变成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经过严格审查,是三代贫农出身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三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三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大。结婚每个人都有份,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严格限制。1969年国庆节我从大同回家过节,派出所把我抓起来,关了我三天三夜。理由是没有回家的证件。派出所明明知道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但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就把我当专政对象完成了一次任务。农民要进城就更难了。中国人不管是城里人或农民都没有旅行的自由。那时的人比山西的黑窑好不了多少。黑窑里的人能够逃出来就得救了,可是“文革”的时候你是逃不出中国的。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特别勇敢的人试图逃出去。我在佳木



斯时同房间的一位室友,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试图游泳去香港(他是广东人),结果被发现,拿枪逼回来,被判了刑。现在大家可以自由出进香港,那时候可不行,想出境就是叛国,你只能在国内受难。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吃的那种。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二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忽然买到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从来不上馆子,全部北京的馆子数大概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偶然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验能够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

然后谈到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30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都有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到1979年增加到9亿。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就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可供分配。一家人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是不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上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杨继绳)。

城里人想什么?只能想毛泽东思想,别的是不允许想的,连听也受限制。如果你收听美国之音,就是犯罪。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尖锐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人说“吾思故吾在”。一个人连思想都没有了,其实这个人也不存在了,或者他变成奴隶了。

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

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过。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口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龄在35岁以上的农民几乎没有不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呆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三年自然灾害时如果让农民出门讨饭,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还倒行逆施地出口了420万吨粮,够两千万人吃一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政绩),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所以我说自由是抵抗灾荒最有力的武器。

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十分,年轻妇女记七分或八分(就看你和队长的关系如何),其他情况记五分到八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平均劳动一天的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不到一毛钱,个别甚至出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少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原粮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多好几倍。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担心中国会有粮食危机的朋友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放心了。不过追求高产的效率是很低的,投入多,产出少,不值得这样做,还是买进口粮便宜得多。现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越来越多的人营养过剩,得了肥胖病、脂肪肝。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不过。不过改革中也出了许多问题。哪些是改革正确的方向,哪些是错误的教训,一定要客观地总结。我们不要迷失了方向,不要把正确的变化看成了错误。这样才能继续朝前发展。